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国家建设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验

曹海军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84)

摘要: 根据国家建设理论中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这两个概念反思我国六十年的国家建设历程, 坚持党的领导, 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目标, 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党领导下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立足于党的建设、调适与转型。由历史形成的“党领导国家”政治形态,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建设与完善来取得自主性与治理能力, 以面对及回应内外政治环境的挑战与变迁。通过意识形态建设、党对人力的调动与运用、治理国家, 加强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建设。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国家建设; 国家自主性; 国家能力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6-0005-06

一、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

“中国模式”导致的中国崛起, 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它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进程。反思我国六十年的国家建设历程, 探究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条基本经验就是, 坚持党的领导, 逐步推进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简单说,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就是, 国家建设是以国家政权活动为轴心的统辖性实践活动,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领导核心。国家建设与党的领导这两个基本问题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党的“十七大”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在总结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命题, 从而在逻辑上完成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国家建设发展规划, 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和完成的。

现代国家建设或民族国家的崛起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综观中国近代史, 现代化与民族主义运动开启并推动了中国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历史

进程, 列强入侵, 帝国崩溃, 军阀割据, 后发经济、民族独立, 国家统一等一系列国家政权建设的出现源自于这一基本的动力之源。进而言之,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建设肇始于传统社会的全面性解体与整体性危机, 整体性危机意味着亟需全能性的组织担负起社会全面重建的历史重任。根据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一般图式和现代国家建设的一般规律, 在现代政治上, 欧美的自由民主模式与苏维埃的共产主义模式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两个主要“参照社会”。历史证明, 在两种模式的角逐与较量中, 中国无法走上以自由宪政的代议制为基础的国家建设的道路, 即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 而是模仿由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模式, 走上了政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道路, 这也是后发展国家与自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初始条件上的差别。

此后, 中国共产党人也走向了这一党领导国家建设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从中国整个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情势和演变逻辑来看, 现代史上的社会革命与全面战争需要的是动员型政党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协调、整合直至重建。在这一点上,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存在着原则与策略上的分歧与差异。基于此, 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 国家在对社会的渗透、汲取与协调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建构与重建模式。约略言之,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社会革命与全面战争战略, 国民党实行的是精英革命

收稿日期: 2010-06-25

基金项目: 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改革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08BZZ002)

作者简介: 曹海军(1975-), 吉林长春人,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政府理论与中国政治与政府。

与有限战争战略,国民党过分依赖精英和单纯的军事力量,对中国近代的社会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动员战略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中国共产党则逐渐摸索出中国特色的社会革命之路,成功地建立了动员型政党,并以此建立了人民的武装,展开武装斗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将精英领导与民众的广泛参与结合起来,形成最佳组合的“三大法宝”。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和十年“文革浩劫”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思路和治国方略逐渐成熟完善起来,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也就从革命的逻辑转向了建设和发展的逻辑。在革命的逻辑下,国家建设关注于主权的独立与政权的统一。在建设和发展的逻辑下,国家建设关注于现代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育。^{[1][2]}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各种危机和挑战也成为了前进中的动力。从国际环境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苏东政权的瓦解令西方国家产生了共产党政权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预期,作为唯一共产主义大国的中国,遂广受世界舆论与学界预测,中国会成为下一个骨牌。从国内环境来看,经济改革的阵痛引发了诸多社会转型问题,如社会的相对剥削感、国营企业亏损、银行坏账、大量失业潮与官员腐败等等负面作用。由此也引发了有关“中国崩溃论”的猜想。但事实却是“中国崛起”代替“中国崩溃”,反击“非典”,承办奥运会,一改西方世界“妖魔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发展。究其原因,这些国家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和克服的难题,都可以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反应(reaction)、抵制(resist)适应(adaptation),以及回应(respondence)外界变迁与挑战的能力(capacity)。

国家建设理论(state-building theory)对此做出了恰当的回答和解释。国家建设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国家是在政治和经济过程中具有自主性(autonomy)和能力(capacity)的行动者(actor),在国内与国际环境构成的结构约束下呈现出行动的绩效(performance),这种行动绩效就是国家的强度(strength),是用来描述国家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变量。分别来看,国家自主性的观点来自于国家建设理论的国家观,根据斯科切波的观点,“国家被视为对其领土范围与人民具有控制权力,可以形成并推行其政策目标而不是单纯地反映社会团体、阶级或社会利益或需要的组织”。^{[2][9]}也就是说,国家自主性成为了国家的重要内涵,国家若缺乏独立自主形成政策并执行政策目标的力量,就无法成为一个重要的行动者。根据这一概念,

国家自主性可以定义为,国家依其意愿偏好与能力来制定政策或设定国家目标,而非单纯地反映社会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国家建设理论的另一重要维度是国家能力的概念。斯科切波对此做出了经典的表述,“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行动者,更进一步地说就是要解释国家在执行政策目标的能力(capacity),特别是在国家面临实际或潜在的社会团体势力或者是身处艰难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2][9]}此外,为了解决国内外的危机与矛盾,国家需要表现出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国家拥有高于社会权威的基础,更是现代国家用以解决其面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国家合法性危机。

根据国家建设理论,运用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分析框架,就会清晰地发现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地回应政治环境变迁与风险挑战,在一连串的“反应”、“抵制”与“适应”的过程中,完成了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总体来说,国家自主性是国家能力的前提要件与背景,二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国家自主性为国家能力的提升提供基础,而后的增进又强化前者的确立,两者在彼此强化中取得了协同效果(synergy)。

二、“党领导国家”与国家自主性

就国家建设的学理而言,历史形成的中国“党领导国家”(party-state)的政治形态决定了国家的自主性应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自主性相互协同、互相增强。在西方社会,国家建设流派的兴起奠基于西方多元民主社会的客观基础与人文属性,因此国家自主性的研究是国家如何能在多元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的影响下,仍能坚持国家政策的专业性与公正性。而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下,这一命题则应转变成,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国家与领导国家过程中,如何形成自身的自主性(autonomy)?葛兰西认为,政党的目的是要创造政治意志。因此,在建构全民政治意志过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也树立了自身的国家自主性。西方国家获取自主性是通过对抗、协调与管理众多的利益团体,与此不同,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获取主要是如何形成自身行动的比较优势(relative advantage)与自主意识(autonomy consciousness)以提升自身的能力或国家能力,来获得自身的偏好政策或目标,由此国家的自主性也得到了相应的确立。概言之,党领导下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立足于:党的建设、调适与转型。

就自主性而言,首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根据

列宁建党思想建立起来的。以政党光谱学而言，列宁主义政党应属于群众动员型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并重视群众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是准军队性质的强力组织，以权力集中、纪律严明、行动一致为特征。这个由职业革命家为主导的党，由优秀人才组成，它独立于群众之外，却又和群众保持接触。党提供意志和指导，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归纳列宁对于革命的建党理念有：第一，集中制。权力集中于中央，工作分散于地方。地方组织是为巩固中央领导。第二，先锋队特性。列宁分析俄国实际情况发现，革命无法依靠群众的自发性行为，必须用职业革命家的作用。先锋队的特性就是要求职业革命家党作为实践革命、领导群众的先行者，担任起先锋的角色。第三，党对群众立场。主张“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焦点应放在群众身上，透过对群众力量的体现与掌握以获得群众支持。第四，知识分子的领导与中介角色。不管是对革命理念的宣扬、对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或在实际斗争，都仰赖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具有是层级性，便于权力集中和分散。从中央委员会组织、省级党组织、乡镇级党组织，直到基层党组织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其中，中国共产党赋予全国代表大会(全代会)最高权力，“全代会”由所有党员选举党代表而产生，党员代表则在省级及基层的党组织选举产生，以反映权力的分布情形。它被当作汇集党员甚至人民意见的功能，它创造一种意义与气氛，使来自中国各地的基层党员也能参与党的重要决定。这使党员产生承诺感而团结与忠于党。党依托其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使得全党各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的下级组织须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

最后，重视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传统。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合称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在改革开放后，党的建设仍然是重要法宝。党的建设主要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还可加上党的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等。加强党的建设是为更好的领导全党和全国。自“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党建设总体布局，这有两个结论：一是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以加强党执政能力为重点，而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二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其关键在党。总之，党建设总体布局在增强党的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基本上，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潮流与政治环境剧变下的时代产物，党的建设乃至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

都可视作自身党组织对政治环境挑战的反应是成功的，也是党自身“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建立与运作。根据这一观点，苏东政权的垮台是这些国家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衰退而无法应对政治环境变迁所致。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党的建设与完善来取得自主性与治理能力，以面对及回应内外政治环境的挑战与变迁的。

三、党领导国家与国家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国家自主性”建设过程与结果中，奠定并累积了“国家能力”的来源与基础。具体说，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建设大体上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党对人力的调动与运用、治理国家。

第一，意识形态(ideology)是“党领导国家”进而增强“国家能力”的泉源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寻求使现行秩序与其本身特权地位作合理化结合的观念。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意识形态通常具有团结政治组织成员以达成政治行动之目的。因此，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交织成一体，具有以下特征：①以群众为取向(mass-oriented)，意识形态要求直接向社会大众开放以便动员群众；②以实践为取向(praxis-oriented)，意识形态不仅企图对群众进行观念启蒙，而且动员群众掀起广泛的社会集体实践。从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角度看，最具原初形态的“意识形态建设”往往就是指涉一个国家的立国基本精神，以及这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得以立基的信仰与价值体系。事实上，任何政权都会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出发，将意识形态视为追求“国家利益”与“国家目标”的手段，此种利益与目标通常有：政治稳定、政治整合与经济发展。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的统治更多的是强调其透过国家机器所展现的共同信念、自我认知、理想价值、以及各种具有支配性权威的思想和主张，并以其所具有的信仰与共识基础作为统治的认同基础。意识形态是维护合法性统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接合剂，具有形成公共论述架构的特质。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的范畴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不仅提供群众论述与言说的思维架构，同时也提供丰富的论述和言说的素材。这种公共论述架构的形塑作用，对凝聚社会共识，巩固既定的政治秩序，规范群众的政治行为，以及内化特定的信仰价值等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诠释体系而言，无论是“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已经成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体智慧的结晶，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存续发展道路与具备全党共识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结合起来。

综合而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在内涵上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特殊的国情状况相结合，进一步地根据领导人或领导集体的认知和经验，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一套思想和理论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此官定的意识形态，以解释和辩护当期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各种现象，并经由权力和制度的安排，使理念化为具体的行动纲领，进而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提出策划的蓝图。

第二，党组织对人力的调动与运用。“党领导国家”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能力”实质上是由党员或组织武器所汇集起来的协同效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力能单独决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目标，然而要达到这些目的，主要透过筛选与增补党员而完成。党员是社会人口结构的先锋与优秀分子。理论上，共产主义源于欧洲的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也以工人运动为革命的原因、动力与目的。其党的目标诉求或人力支持也以工人为基础。同时，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农民运动自毛泽东开始就得到了高度重视。其次，青年特别是学生运动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原则上，以党领导青年团，以青年团领导学生运动，以学生运动带动工农群众和妇女儿童及其它一般群众。早期中国共产党从事游击活动时期，主要干部来自社会底层，党的干部联系中国共产党与一般群众，此即毛泽东所谓的“从群众中来，也从群众中去”。大部份基层干部是农民，主要管理当时的农村事务。此外，当时党组织的游击队运作形态需要党员献身给党，并严格遵守党纪与“民主集中制”。建国后，党的干部主要管理国家的社会与经济事务，这种人才需管理技巧与经验，已不是来自农村或游击队背景可满足条件，这时，除了党员的身份背景与忠诚度等德性要求之外，教育、技能、才干与经验逐渐成为党选干部的重要选项。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将党员管理视为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部份。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管理其内涵主要包括：① 党员发展：遵照党章规定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各界优秀人物吸收到党组织；② 党员组织管理：管理党员的组织生活、民主评议党员、党员完成年度目标责任制、党员联系户与责任区、评选优秀党员、处置不合格党员等工作；③ 党员教育：按规定对党员实施以马克思理论、党基本路线、党基本知识为核心的“三

基本”教育，同时辅以其它知识教育，并配合各级、各种形式党校为主的教育；④ 其它工作：包括党籍管理、党员统计与党费管理等。党员管理实行“一级指导一级”的垂直管理体系，即中央级、省级、地方级、县区级、基层党部等。同时，宣传系统、纪律检查系统、中共人大、政协、政府、群众组织、社会团体也承担部份的党员教育与管理工作，但要接受同级党委的指导与协调。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党员结构与党的领导体制也因经济建设需要而逐渐调整。近年来，特别是“十六大”第一次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写入党章，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与合法化基础。随着非公有企业党组织和党员人数成长，非公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升党组织的体制转变，这是具有制度变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的事实。事实上，伴随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也经历，从起步、探索到不断拓展的过程。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人力资源组织通过对人民群众的优化配置而成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石。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好似无所不包的连环套，以党为“核心”，贯串社会各阶层的“外围”，从而将各类组织凭借功能上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 of function)整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借此产生了巨大的组织意识、自主性与国家能力。

第三、治理国家。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工农阶级对国家领导的先锋队。因此，中国共产党是所有政治权力的来源并合法控制其它各种类型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对政府机器这复杂系统进行指挥与控制是通过政府各机关来实行党的政策与计划。若把国家定义为一个组织系统，则政府是这个组织的核心部分。但在中国除行政系统外，还有一套附在行政系统之上的系统与组织此即党务系统。它在中央有直属机构，各省市有党委，党的基层组织则渗透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小区、社会团体、军事连队等等。党务组织与系统其功能在维持中国共产党统治。虽说行政管理国家，但党抓政治，党管政治。此外，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管干部的机制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制度之一，并由此实现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中国共产党由党内而党外，控制所有组织、机构、人员和社会，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

四、结论

苏东剧变后，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严肃思索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整党”，还是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以及新世纪的“三讲教育”与“三个代表”的党内学习运动，“保持党员先进性运动”都不例外，都可视为中国共产党回应环境挑战的适应性举措。事实上，不论党的改革或政策创新与调整，都将带来“党领导国家”体制的渐变与转型，其目的主要在适应外界的变化与挑战。虽然，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整风”已非之前的斗争形式，但着眼于强化执政与巩固权力的政策逻辑却是殊途同归。比如，为解决国际、国内与党内的棘手问题，“十五大”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标，这包括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及维护安定团结。就某一方面而言，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改革手段来纠正党的结构缺失，以巩固国家自主性从而获取或增强国家能力来维系政权的存续和发展。

党务改革应可视作党的领导体制转型的一环。在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是高度制度化的，但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之后中共从事转型与加强制度建构。这转型与加强的过程与本质，是稳定化、合理化、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例如1982年，“十二大”为加强与维护内部纪律，就增设与制度化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这一新机构。从2002年“十六大”以来，党的改革进入快速期。从中央到地方，在党务公开、党内民主建设方面已形成一些制度，如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地方各级党委的常委会、纪委会分别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做工作报告等。又如试行“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以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都有助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制度化合理化与应变能力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开放型政党，保证党员群众对组织活动有充分“知情权”，以监督领导干部的执政行为。

此外，改革轴线自胡锦涛总书记接任以来，再度将“党内民主”列为政治改革重点。十六大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并提出具体措施与制度建立(institution building)，这包括：①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探索闭会期间发挥功能的方式；②完善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全委会的作用；③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④建立和完善党内的状况通报，反应和重大决策的征求意见等等。2007年10月，“十七大”指出，过去五年，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成果，就是党的集体领导得到加强，胡锦涛指出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

合，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事实上，中共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既是中共中央集体领导探索创新的过程也是全党形成政治共识的过程。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越来越注重与加强集体领导，在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期间，相关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在历史经验上，中共在集体领导上曾有惨痛教训。为加强集体领导，十六大对党章作补充，明确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等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后作出决定。基本上，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形式就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的重要目的是避免“一个人说了算”，个人不能决定重大问题，这是党领导的重要原则。就制度观点而言，组织保障即制度性或制度化的稳定性保障，这实质上在增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拒变防腐”作用。

胡锦涛进一步强调，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于是，“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和规划陆续出台。另外，在十七大上，胡锦涛提出，要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的“票决制”。其次，200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明确规定对重要干部的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

诚然，党的组织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如邓小平1980年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3](389)}人民对若干党政官员的腐败、道德沦丧、官僚作风心存不满。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在外界预测将遭到崩溃与覆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而且日趋发展为“中国崛起论”的大国声誉与地位，这说明自身的“正面力量”或“支持因素”起到了支配性作用，从而有效地化解了消极因素的破坏作用。这正是“党领导国家”体制转型，以适应政治环境变迁与挑战的作法与国家行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行为基础必有其“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为支撑。在中国，党是通过党组织的完整性与操作来确立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中国共产党是全民结构的优化组合与制度设计，进而再用党组织去导引与控制人民群众，以达到政权稳定之目的与效果。目前，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治国方略进一步强化和明确了“党领导国家”作为中国模式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林尚立.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2]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Bring the State Back I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stat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state-building experience

CAO Haijun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10018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state-building of state independence and state capacity to reflect on the two concepts of its state-building history of sixty years,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achieve state development goal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xperience, Party under the leadership capacity of state independence and state legislation on party building,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he CPC has established "the party leading the state" political form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arty to obtain independence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o face and respond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and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has strengthened the building through ideology, the party's mobilization of manpower and us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thus reinforcing the par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tate capacity building.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te-building; state autonomy; state capacity

[编辑: 颜关明]